

清乾隆年编《华夷译语》述论

A Study of Huayi Yi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春花 李英 郭金芳

Chunhua Li Ying Guo Jinfa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8 Vol.19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八年 总第十九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清乾隆年编《华夷译语》述论

A Study of *Huayi Yiyu* Compiled in the Qianlo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春花 李英 郭金芳

Chunhua Li Ying Guo Jinfang

内容提要:

清代乾隆帝对于民族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由礼部下属会同四译馆与军机处一同主持纂修国内外众多民族语言辞书,今统称为《华夷译语》。当时《华夷译语》尚未刊行,均为孤本,并珍藏于皇宫大内。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及故宫出版社发掘整理影印出版馆藏42种71册《华夷译语》,可为世人展示罕见的资料,也可为十八世纪西欧、东南亚及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语言学和翻译史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

关键词:

清代 民族 西洋 藩属国 语言

ABSTRACT: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always had a concern over ethnic issues. Upon the imperial order of the emperor, the translation institute *Huitong siyi guan* under the Ministry of Rites began to work together with Junjichu or the Grand Council in 1748 (the 13th year of the Qianlong era) for the compilation of multi-language dictionaries, collectively known as *Huayi Yiyu* or *Translated Terms in Chinese and Ethnic Languages*. Back then, none of the *Huayi Yiyu* dictionaries was published. As only extant copies, they were i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The Library of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have co-published 71 *Huayi Yiyu* dictionaries in 42 languages, photocopied from the museum's collection. The precious historic literature greatly facilitates the study of ethno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of West Europe,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west China.

KEYWORDS:

Qing dynasty, ethnic group, the West, vassal state, language

《华夷译语》是明清两代朝廷以对外交流的需要,由官方组织编纂或刊行的各种《译语》、《杂字》、《来文》的统称。这些书中并未署有《华夷译语》名,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 Fuchs)发现该类典籍,并统称为《新华夷译语》,后日本学者纷纷研究该类典籍,也随称《华夷译语》,并分甲、乙、丙、丁四类。其《译语》部分是对国内外各民族语言词语,译成汉语,并用汉字注音而成的词汇集,是今人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及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目前国内外各馆藏机构藏有《华夷译语》百余册,而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西番译语》、《川番译语》、《猓罗译语》、《西天真实名经》、《琉球土语》、《广西庆远土司译语》、《广西镇安土司译语》、《广西太平土司译语》、《车里译语》、《猛甸译语》、《猛麻译语》、《僂夷译语》、《耿马译语》、《镇康译语》、《猛卯译语》、《潞江译语》、《南甸译语》(梁河县)、《湾甸译语》、《芒市译语》、《孟连译语》、《干崖译语》、《暹罗番书》、《缅甸番书》、《苏禄译语》、《咭喇国译语》、《弗喇安西雅语》、《伊达礼雅语》、《额呼马尼雅语》、《播都噶礼雅语》、《拉氏诺语》,共四十二种七十一册。但其名称(本文以封面题名为准)不完全统一,有“□□译语”、“□□语”、“□□话”、“□□书”、“□□经”等,这些“译语”均紫色粗布封面,黄纸书签,上书汉文书名,显然不是皇帝御览的进呈本。然而,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整理清宫所藏文物、档案时,这些书籍却藏在军机处方略馆。

从理论上讲,这些“译语”均是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由“会同四译馆”与军机处一同主持编成的。此外,还应有进呈御览本。因这些“译语”的主持者傅恒、陈大受、那延泰等均是军机大臣,皇帝御览审定后送交军机处,由军机处主持校订录副之后,再交给“会同四译馆”校勘成册。从而推断所谓的“丁种本”至少有初稿本、进呈御览本、军机处录副本、“会同四译馆”校勘本等四种版本,其中进呈御览本、军机处录副本应保存于皇宫大内。

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多数“译语”篇幅、版式特征、编写体例、词语内容基本一致。四周双栏,白口,无鱼尾,开本:25.7厘米,17.5厘米,边框:21.5厘米,15.5厘米,均以汉文古籍的翻页形式装订成册,正文半页六栏,共四组单词,每词语横写三栏,首栏列民族语文,下栏列汉文译词,最下栏列汉文对音字,编写体例与汉文古籍一致。仅《西天真实名经》、《僂夷译语》、《琉球土语》三种内容、体例有所不同,其中《西天真实名经》是梵汉合璧词典,收录梵文字母及汉文对音字,正文半页四行,共六组字,每组第一行列梵文字,第二行列汉文对音字或切音字,共四十四页,收五百一十九条字。《琉球土语》正文半页两行,共四组词语,上列汉字,下列以汉字标写的琉球语词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草木、鸟兽,共十一门,收二百八十七条词语。《僂夷译语》是傣汉合璧词典,僂夷指的是傣族先民,此书正文体例与其他“译语”一致,但其类目与其他“译语”截然不同。目前这些“译语”的各种版本尚未被系统地整理挖掘,从纸张、封面、装订形式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应是军机处录副本。

从使用角度看,“会同四译馆”应保存一部完整的版本。“会同四译馆”由“四译馆”、“会同馆”合并而成。原“四译馆”馆舍在正阳门外杨梅竹斜街,而“会同馆”馆舍在玉河桥以西,合并后的“会同四译馆”并没有新建馆舍,而就设在“四译馆”原址上,但各藩属国朝贡使臣所居馆舍有安定门大街、正阳门外横街、东江米巷玉河桥三处。

十三年谕提督四译馆……馆舍旧有三处:一在玉河桥,一在安定门大街,一在正阳门外横街。

原系豫备贡使：馆舍，并非会同馆衙门，今新设会同四译馆衙门，即以四译馆充设，无庸更建。所有四译馆册籍番书，仍于馆内收贮。¹

其实，朝鲜、暹罗（今泰国）、南掌（今老挝）等国使臣原居安定门大街馆舍，后馆舍房屋毁坏，朝鲜使臣移居东江米巷玉河桥馆舍，暹罗、南掌使臣搬到地安门外新扩建馆舍。安南（今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等国使臣原居正阳门外横街馆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移到宣武门内京几道胡同（瞻三坊），三十二年（1767年）将正阳门馆舍交内务府管理，嘉庆年间朝鲜使臣搬出玉河桥馆舍，移到东城“四译馆”。

总之，“四译馆”、“会同馆”及“会同四译馆”编刊的书籍，于乾隆年间仍在“会同四译馆”内收藏。可这些版本以及献给皇帝的进呈本，目前却已散佚在全世界各馆藏单位或个人手中，为研究者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一 “会同四译馆”及军机处纂修“译语”历程

明廷建立之初，为北伐北元朝蒙古残余势力的需求，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丙戌日（农历），皇帝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及编修“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按《蒙古秘史》体例纂修了蒙汉合璧的第一部《华夷译语》，二十二年（1389年）刊行。此书是一部蒙汉对译的词汇集，词语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衣服、饮食、珍宝、人物、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共十七门，首列用汉字拼切的蒙古语词语，下列汉文译词，共收八百四十条词。至永乐五年（1407年）在翰林院属下设“四夷馆”，分鞑靼（蒙古）、女直（女真）、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波斯）、百夷（傣）、高昌（回鹘、察合台）、缅甸八个馆，开始大规模地编修各种“译语”，并选国子监监生学习翻译这些语言。

流传至今的明代“译语”有《鞑靼译语》、《女真译语》、《西番译语》、《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百夷馆译语》、《高昌馆译语》、《高昌馆杂字》、《日本馆译语》、《朝鲜馆译语》、《河西译语》、《畏兀儿馆译语》等。弘治七年（1494年）将“四夷馆”改隶太常寺，正统六年（1441年）增设八百馆，以编纂云南各族“译语”，并将九馆改为南、北二馆制。北馆内含六所，南馆内含三所，设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分管南、北二馆。万历七年（1579年）增设暹罗馆，以编纂马来“译语”，随之八百馆又增修了《缅甸译语》、《暹罗译语》等。

清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入关后用很大的精力解决满、汉、蒙之间的民族矛盾，妥善处理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平息金川土司反清内乱开始，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和回部反乱，又打败廓尔喀对西藏入侵等，最终统一了各民族，使清朝迈入了鼎盛时期。自康熙至乾隆时期，疆域空前扩大，经济保持繁荣，形成了康乾盛世的多民族大一统的辉煌局面。随之朝鲜、琉球、暹罗、安南、缅甸、苏禄、南掌等国先后成了清廷的朝贡国，其中朝鲜，原名“高丽”，是对清廷最早朝贡的国家，早在崇德二年（1637年）清军入侵朝鲜，将国王世子当人质，于是国王臣仆纳贡，有年贡、节贡两种。六年（1641年）琉球国王闻声，

1 （清）托津等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〇一，礼部，第6～7页，清嘉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请求册封。其余暹罗、缅甸、苏禄、南掌、安南等藩属国均自雍正年开始朝贡清廷。

“会同馆”、“四译馆”是清顺治元年（1644），仿明制所设专门从事掌管朝廷与各藩属国间外交事务的官署衙门。前者负责接待朝贡国、藩属国使臣食宿事务，隶属礼部，由大使一人主管馆事。后者负责翻译朝贡国、藩属国来文及陪同使臣交流翻译等事务，同时培养翻译人才，隶属翰林院，由太常寺汉少卿主管馆事。明代称“四夷馆”，因“夷”字是中原汉人统称少数民族的贬义词，如“内中华而外夷狄”，其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均是因地而名，“夷”、“戎”、“蛮”、“狄”均是汉人大一统而斥偏安的贬义词。

因清朝是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于是顺治元年（1644年）为避讳这些字，将“四夷馆”改称“四译馆”，内分鞑靼、女真、回回、缅甸、百译、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十馆，分掌各朝贡国及藩属国各族语言翻译事务。二年（1645年）“四译馆”内置典务厅。因为至清代，女真语早已演变成满语，且清廷多数满族人通晓蒙古语。显然，翻译已不成问题，至十五年（1658年）裁鞑靼、女真二馆，又变成了八馆，各馆设正教序班一员，协教序班一员，以管理本馆日常事务，其译字生来自本堂官世业子弟，通过礼部会考选拔出来，学期三年。十八年（1661年）裁翰林院，将“四译馆”归并到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年）重隶翰林院。

由于清廷标榜“同文之盛”，在朝贡国、藩属国先后建立义学，教习汉语、汉文。至乾隆初年朝贡诸国内朝鲜、琉球、安南表章均用汉语，无需翻译。其余苏禄、南掌、暹罗诸国表章，由各省督抚令通事译录具题。因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土司，早在雍正年间已改土归流，设置州、府，皆隶大清版图，由本省管理一切事务。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等藩属国以及挑州、岷州、河州、乌思藏等处番僧也已入贡，并统隶理藩院，而“四译馆”承办事务却日渐减少。

于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命将“四译馆”归并于礼部“会同馆”，改称“会同四译馆”，由礼部郎中一人，带鸿胪寺少卿衔兼管馆事。以后又增设满、汉稽查大臣二员，由各部院满堂官内简派。其下还设汉大使一员，即掌“会同四译馆”馆舍；此外还有序班二员，掌教译字生；通事八员、经承八员等，管日常事务。凡贡使来京，都住“会同四译馆”馆舍，由馆舍供给贡使所需器用、粮食、柴炭等，事竣造册送户部主客司咨，由户部核查报销。贡使觐见皇帝行礼后在礼部赐宴，或在午门外颁赏，都由“会同四译馆”馆卿引导，并负责翻译。

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五月“会同四译馆”下分设“西域馆”、“百夷馆”二馆，代替以往八馆：“合回回、高昌、西番、西天为一馆，曰西域馆。除蒙古、唐古忒毋庸置译字生外，将回回、西番译字生酌留四人。合暹罗、缅甸、百夷、八百并苏禄、南掌为一馆，曰百夷馆。”¹同年九月，乾隆帝在学习藏文的过程中审阅原《西番译语》，却发现其中有讹误之处。为纠正以往所编各“译语”讹误，以标榜清廷“同文之盛”策略，皇帝敕命军机大臣傅恒、陈大受、那延泰等，加以汇集校正各“译语”，乾隆帝上谕礼部：

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音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缺。因思象胥鞮译，职在周官，輶轩问奇，载于汉史。我朝声教四讫，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

1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五，第28页，中华书局，1986年。

之校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与该国附近省分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傅恒、陈大受、那延泰总理其事¹。

分析以上上谕，得知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校勘原“四译馆”编《西番书》，加以校勘，并以新校勘之《西番书》体例为蓝本，调查属下各处民族语言和藩属国语言，重新编纂各馆“译语”。

第二，命咸安宫就近设西洋馆，承办《西天译语》及各西洋“译语”。

第三，命四川、西康、云南等处督抚，主持采集补正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六馆所编“译语”，并陆续调查所辖地域民族语言及周边藩属国语言，编订各种新的“译语”。由傅恒、陈大受、那延泰等主持编写进呈御览后，交“会同四译馆”校勘成册。

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由傅恒、陈大受所办《额呼马尼雅语》、《咭喇国译语》、《伊达礼雅语》、《弗喇安西雅语》、《播都噶礼雅语》、《拉氏诺语》等西洋“译语”率先编译完稿。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谕：

谕军机大臣等，暹罗国使臣，不必俟朕到京，即令回国，再傅恒、陈大受所办西洋等国番书。

暹罗国人，现既在此，可将伊国之文字，交尚书王安国，向伊等询问明白改正，寄信与来保知之。²

次年，由四川总督策楞督办的译语共编成11册，七月由策楞上奏并进呈，包括《西番译语》（即馆藏《川番译语》）、《猓罗译语》两种。如：

策楞又奏：遵旨采集番书，除土番内或有音无字，或字不全备，无凭采录外，所有龙安、松潘、茂州、保县、汶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冕宁、盐源、叙永等厅、州、县所辖西番、猓罗字语，遵照四译馆《西番书》例，注明音义，就其同者合之，异者分之，统辖之道、府、厅、州、县、并部落土司，载明卷首，以备稽考，计共十一本，谨缮写进呈，得旨览³。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华夷译语”内有《西番译语》、《川番译语》两种均收录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前者五卷、五册。后者九种、九册，其卷端题名仍为《西番译语》，该两部“译语”均是藏汉合璧词典，词语及分类编排体例基本一致。然而策楞奏折内出现了两处“西番”字句，前者为“所有龙安、松潘、茂州、保县、汶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冕宁、盐源、叙永等厅、州、县所辖西番、猓罗字语”，后者为“遵照四译馆

1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四，第25～26页，中华书局，1986年。

2 《清高宗实录》卷三四四至三四五，第13～14页，中华书局，1986年。

3 《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九，第29页，中华书局，1986年。

西番书例”。该两处出现的“西番”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西番译语》、《川番译语》有何关联？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川番译语》每册均有“小序”，以说明所采集词语的地域范围，所标注的地名与《实录》内所提龙安、松潘、茂州、汶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冕宁、盐源等地名相吻合，可见，策楞编纂进呈本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川番译语》相对应，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西番译语》应是原“四译馆”编《西番书》的校勘本。策楞奏折曰“西番、猓罗字语……计共十一本，谨缮写进呈”，该“西番”应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九册《川番译语》对应。但其“猓罗”的册数却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五册《猓罗译语》有了出入。显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与策楞所奏进呈本不吻合。关于该问题，聂鸿音、孙伯君编《〈西番译语〉校录及汇编》时，到达川西地区实地调查，并与《清史稿》、《四川通志》等史料核对，还根据《西番译语》、《猓罗译语》各种版本，指出策楞进呈的十一本为《西番译语》九册，《猓罗译语》二册。

至十六年（1751年）在“会同四译馆”内设立“朝鲜译学”，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用心学习。十九年（1754年）趁苏禄苏丹国使者来华，皇帝命百夷馆属下增设苏禄馆，开始编写菲汉合璧的《苏禄译语》，同年完稿；二十六年（1761年）百夷馆属下又增设南掌馆，开始编写老挝语汉语合璧的《南掌译语》，同年完稿。如：

十九年奏准：四译馆旧无苏禄国番书，令司官就该贡使询问采集，审别音义恭呈御览后，送交军机处……。二十六年奏准：四译馆旧无南掌国番书，就该贡使询问，据录出所能记忆者，审音分类，总共六百十有二字，进呈御览。¹

可见，苏禄、南掌二馆设馆的同时，开始编纂了《苏禄译语》、《南掌译语》，均是由司官询问朝贡使臣采集词语，后送交军机处审订成册。后来逐渐增编真腊、爪哇等“译语”。随着鸦片战争的敲响，清廷逐渐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间的通商贸易加大，与周围朝贡国及边疆民族间的联络松弛，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同四译馆”被裁撤，再没增编其他“译语”。

总之，清代“译语”比起明代已增多了朝鲜、日本、安南（越南语）、占城（占语）、满刺加（马来语）等“译语”。但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华夷译语》中没有收录南掌、真腊、爪哇语、朝鲜、安南、占城、满刺加等藩属国语言的“译语”。由傅恒、陈大受、那延泰等奉敕纂修的《华夷译语》，就是如今德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及日本学界统称的《华夷译语》“丁种本”，其多数“译语”自乾隆十三至二十六年（1748年～1761年）间在“会同四译馆”先后编成，而各西洋“译语”编纂地点为咸安宫附近的“西洋馆”，编者应为传教士。云南、四川、广西等边疆地区各民族“译语”是在各省督抚主持采集补正以往“译语”，进呈御览后交军机处审定汇总录副之后，转交“会同四译馆”校勘而成。其余诸藩属国“译语”是司官询问朝贡使臣采集词语，进呈御览后送交军机处审订汇总录副之后，转交“会同四译馆”校勘而成。可见，《华夷译语》“丁种本”是诸藩属国语及边疆民族语言与汉文对音、对译的翻译词典，当时究竟编纂了多少种“译语”，笔者不得而知。

1 （清）托津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〇一，礼部，第11～12页，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以下介绍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四十二种、七十一册“译语”的语种、文种、词语、内容等特点。

“会同四译馆”属下分设“西域馆”、“百夷馆”二馆，前者是合并原回回、高昌、西番、西天四馆而成，后者是合并原暹罗、缅甸、百夷、八百四馆而成，后增设的苏禄、南掌二馆也并入“百夷馆”。此外，为编纂西洋“译语”，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咸安宫附近新增设“西洋馆”。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四十二种七十一册“译语”中西域馆编纂的“译语”较少，只有十种，十册；百夷馆编纂的“译语”较多，多达二十四种，二十八册；西洋馆编纂的“译语”七种，二十八册。而原“四译馆”属下西番馆新校勘的“译语”一种五册。

二 “西番馆”新校勘的“译语”

《西番译语》，收录卫藏方言词语，共五册，一函。此书每册卷端上题均为“西番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其余四十一册六十六册“译语”卷端均没有出现“西番馆”字节。显然“会同四译馆”属下已不存在所谓的“西番馆”，笔者认为馆藏《西番译语》是由“四译馆”属下西番馆编成的。关于该问题，前面所举上谕、奏折均可佐证。如：

乾隆帝上谕礼部曰：“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音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缺。因思象胥鞮译，职在周官，輶轩问奇，载于汉史。我朝声教四讫，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著交与该国附近省分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并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傅恒、陈大受、那延泰总理其事”¹。

策楞又奏：遵旨采集番书，除土番内或有音无字，或字不全备，无凭采录外，所有龙安、松潘、茂州、保县、汶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冕宁、盐源、叙永等厅、州、县所辖西番、猺罗字语，遵照四译馆《西番书》例，注明音义，就其同者合之，异者分之，统辖之道、府、厅、州、县、并部落土司，载明卷首，以备稽考，计共十一本，谨缮写进呈，得旨览²。

从乾隆帝上谕看，原“四译馆”藏有《西番书》，并曾重新考订。从策楞奏折看，遵照“四译馆”《西番书》例，编纂了新的《西番》、《猺罗》等字语，共十一册。笔者认为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五册一函的《西番译语》是，原“四译馆”藏《西番书》的校勘本，仍由“四译馆”属下西番馆编成，本文统称“新校勘之《西

¹ 《清高宗实录》卷324，第25～26页，中华书局，1986年。

² 《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九，第29页，中华书局，1986年。

番译语”。策楞进呈的《西番》为九种九册的《川番译语》，因其卷端题名为《西番译语》，封面提名为《川番译语》，所以学界也统称《西番译语》。笔者为了与五册一函的《西番译语》区分，本文将策楞进呈本称为《川番译语》。

新校勘之《西番译语》正文首栏列藏文词语，下栏列汉语译词，再下栏著汉文注音。

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彩色四门，收录有关日月、风云、土地、山河、春夏、秋冬、黄白、红绿等方面的名词、形容词，共四百二十一条词语。

第二册分身体、人物、器用三门，收录有关四肢、五官、君臣、官民、座椅、板凳等方面的名词，共四百十条词语。

第三册分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珍宝、经部六门，收录有关房屋、厅堂、茶米、油盐、衣裤、冠带、鞋帽、方位、金银、珠宝、佛神、经卷等方面的词语，共三百七十八条词语。

第四册分文史、鸟兽、数目、通用四门，收录有关诗书、册文、龙虎、牛羊、数目、字画、耕种、补用、教训等方面的词语，共四百三十七条词语。

第五册分香药、花木、人事三门，收录有关香木、药材、松柏、花草、忠孝、婚丧等方面的词语，共四百五十七条词语。

《西番译语》比起明代所编《蒙古译语》多收经部、人事、香药三门，所收词语中名词居多，也有一些动词、形容词、数词等。从词语内容看，主要收录日常生活、生产有关的词语，其中该地出产的物名居多，即汇集了贡品名物。合计二十门，两千零三条词语。

原四译馆所藏《西番译语》是所有《译语》、《字书》、《杂字》中词汇量最丰富的一部，被乾隆帝认为是最完善的一部，但仍有不少的谬误之处，为此先下令西番馆校勘此书，并下令其它“译语”均按新校勘之《西番译语》体例编纂。

三 “西域馆”编纂的各“译语”

“会同四译馆”属下“西域馆”主要编纂西藏、新疆、琉球等地民族“译语”，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西域馆”编纂的《川番译语》、《琉球土语》，共十种，共十册。

“西域馆”负责纂修的九种《川番译语》均是藏汉合璧词典，由四川省督抚遵旨采录进呈皇帝御览后，由军机处大臣主持“会同四译馆”重考校勘，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成书。其中收录四川省所辖龙安、松潘、茂州、保县、汶川、雅州、宁远、打箭炉、冕宁、盐源等厅、州、县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共九册，合为一函。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藏有《西番译语》四册，具有黄纸封面，封面书签上分别书有《泰宁属明正司所营口外各西番译语》、《泰宁协沈边冷边西番译语》、《泰宁协木坪各村寨西番译语》、《建昌属木裡瓜别各西番译语》等不同的书名。日本学者松川节、三宅伸一郎编《大谷大学博物馆所藏四种〈西番译语〉初编本》¹内认

¹ 松川节、孙伯君：《华夷译语（西番译语四种，猺罗译语一种）》，松川节、三宅伸一郎编：《〈华夷译语（西番译语四种，猺罗译语一种）〉影印与研究》，第15页，中西印刷株式会社，2015年。

定其版本为“进呈御览本”。

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每册封面提名均为“川番译语”，卷端上题为“西番译语”，每册各分二十门，体例基本一致。显然各册间没有先后之别，只是每册附“小序”一页，主要说明所采集词语的地域范围。孙宏开著《〈华夷译语〉考辨》¹内根据每册前“小序”所叙述地域的方言特点，将九册《西番译语》（即馆藏《川番译语》）不仅排序册次，还分别命名。如《松潘译语》（一）、《象鼻高山译语》（二）、《嘉戎译语》（三）、《白马译语》（四）、《栗苏译语》（五）、《木坪译语》（六）、《打箭炉译语》（七）、《多续译语》（八）、《木裡译语》（九）。本文以此为准，详细介绍各册。

第一种为《松潘译语》，其“小序”曰：“四川松潘镇、松茂道、镇标中左、右漳臘叠溪平番南坪等营，松潘同知，各所辖包子寺□右热雾毛革麦杂蛇湾戛眉喜七布阿思洞□巴元壩寒盼商已□命口内羊岗大小姓松坪云昌丢骨□竹寺口外上下、包坐上下、勒凹上下、作革川拓谷尔壩双则宗路谷漠作路生纳班佑阿细合壩独杂辖慢物藏热当磨下、甲凹阿革鹊个郎情上中下、撒路上中下、阿壩上中下、郭罗克上中下、羊岗上中下、阿树、小阿树等西番字语皆同，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松潘译语》主要采集松潘镇、松茂道、镇标中左右漳臘叠溪平番南坪□等营松潘同知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四十四条词语。

第二种为《象鼻高山译语》，其“小序”曰：“四川松潘镇、松茂道、龙安营、龙安府，各所辖土知事薛维綱所管象鼻高山西番，即吐番字语，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象鼻高山译语》主要采集松潘镇、松茂道、龙安营、龙安府属下象鼻高山区的藏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殿、器用、饮食、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四十条词语。

第三种为《嘉戎译语》，其“小序”曰：“四川松潘镇、松茂道、威茂协右营、直隶茂州汶川县、保县各所辖西番内，除协标左营管辖茂州属之静州陇木岳希牟托沙壩水草坪、竹木坎长宁等处番民有语无字，不造外，所有协标右营管辖汶、保两县属之瓦寺杂谷梭磨竹克箕，大、小金川沃日等西番字语皆同，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嘉戎译语》主要采集松潘镇、松茂道、威茂协右营、直隶茂州汶川县、保县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四百四十四条词语。

第四种为《白马译语》，其“小序”曰：“四川松潘镇、松茂道、龙安营、龙安府各所辖水泉關土通判王沅并阳地，隘长官司王沅分管白马路一带西番即吐番字语，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白马译语》主要采集松潘镇、松茂道、龙安营、龙安府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

1 孙宏开：《〈华夷译语〉考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四十二条词语。

第五种为《栗苏译语》，又称《沈边冷边译语》，其“小序”曰：“四川泰宁协、建昌道、协标左营、雅州府，各所辖内除协标右营管辖清溪县属之大田，即黎州松坪所管曲曲鸟猓猓有语无字不造外，所有协标左营管辖之沈边、冷边西番字语相同，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第，译缮如左。”

可见，《栗苏译语》主要采集泰宁协、建昌道、协标左营、雅州府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藏本封面题名为“泰宁协沈边冷边西番译语”，简称《沈边冷边译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四十条词语。

第六种为《木坪译语》，其“小序”曰：“四川泰宁协、建昌道、黎雅营、雅州府，各所辖木坪即董卜韩胡宣慰司坚参囊康所管四十八寨，一十八村西番字语均同，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木坪译语》主要采集泰宁协、建昌道、黎雅营、雅州府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藏本封面题名为“泰宁协木坪各村寨西番译语”，简称《木坪译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书中无此门名，但收录该门词语）、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四十条词语。

第七种为《打箭炉译语》，其“小序”曰：“四川泰宁协、建昌道、协标阜和营、打箭炉同知各所辖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坚参德昌所管辖之革什咱绰斯甲巴底巴旺喇滚咱裡木噶瓦七俄洛白桑恶热上下，八义少鸟石作苏策八哩龙上中，渡他咳索窝笼恶拉上中下，渣壩扒桑木辘格湟卡甲那工美吉增卡桑阿笼沙卡拉里八鸟笼姆朱普供磔鲁密东谷一十六百户，裡塘、巴塘瓦述十土司，霍耳九土司，束暑孔撒科则更平东撒德尔格上下，革责杂谷吗竹卡笼壩春科蒙噶结瞻对瓦述谷纳林葱上，纳夺上下，临卡岗里郭宗云多仪盖桑隆石上下，苏阿上，瞻对下，瞻对字语，具与明正司相同，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打箭炉译语》主要采集泰宁协、建昌道、协标阜和营、打箭炉同知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藏本封面题名为“泰宁属明正司所营口外各西番译语”，因收录打箭炉同知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也称《打箭炉译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书中无此门名，但收录该门词语）、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三十六条词语。

第八种为《多续译语》，其“小序”曰：“四川建昌镇、建昌道、镇标冕山、嘉顺二营，宁远府属冕宁县，各所辖大盐井酥州苗出架州大村阿西热郎瓦阿得桥中村三大枝糯白瓦小相岭及窝卜罢显摆跼瓦尾木术凹等处西番语音与打箭炉口外诸番各别字本藏经，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多续译语》主要采集建昌镇、建昌道、镇标冕山、嘉顺二营及宁远府属冕宁县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殿、器用、饮食（书中无此门名，但收录该门词语）、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四十条词语。

第九种为《木裡译语》，其“小序”曰：“四川建昌镇、建昌道、镇标会盐营、宁远府属盐源县，各所辖木裡马喇盐井卫，瓜别古栢树及中前后左右五所等，各西番字语皆同，照依奉颁字书门类次序，译缮如左。”

可见,《木裡译语》主要采集松建昌镇、建昌道、镇标会盐营、宁远府属盐源县属下地域的藏缅语族语言及方言,日本大谷大学博物馆藏本封面题名为“建昌属木裡瓜别各西番译语”,简称《木裡译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食(书中无此门名,但收录该门词语)、衣服、声色、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二十门,收七百四十条词语。

总之,该九种《川番译语》所收类名与西番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基本一致,只以“声色”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采色”门名,《松潘译语》、《嘉戎译语》、《白马译语》、《栗苏译语》、《木坪译语》、《打箭炉译语》、《木裡译语》内还以“宫室”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宫殿”门名,各门编排顺序也与新校勘之《西番译语》有所区别。合计九册,共六千六百六十二条词语。

以上所述各“译语”中《西番译语》是由西番馆校勘原“四译馆”编《西番书》而成,《川番译语》、《猓译语》均是军机处审定进呈御览本,并转交“会同四译馆”属下西域馆校勘成册。

原“四译馆”属下回回馆主要编纂西亚及新疆一带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通用的波斯“译语”,清初曾有《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各一册,前者为刻本,后者为写本。此二“译语”目前不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后来回回馆归并于西域馆,并主持编纂《琉球土语》(封面题名),其卷端题名为《琉球语》,一种,一册。琉球国位于福建以东的东南大海中,即今日本冲绳县,明朝初年其国王被封为“中山王”,顺治十一年(1654年)开始朝贡清廷。《琉球土语》正文半页两行,共四组词语,上列汉字,下列以汉字标写的琉球语词语,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草木、鸟兽,共十一门,收二百八十七条词语。

总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华夷译语》中“会同四译馆”属下西域馆校勘编纂的“译语”共十种,十册。其中“会同四译馆”校勘原藏“译语”一种一册。四川总督采集词语编订进呈御览后,军机处审定转交“会同四译馆”属下西域馆汇总编译的“译语”共九种,九册。这些“译语”编纂体例基本一致,多数收录二十门,其类名、排列顺序及收录词语均相近,随之词汇量也接近。只有《琉球土语》体例有所不同,所收词汇量较少。

四 “百夷馆”编纂的各“译语”

“会同四译馆”属下“百夷馆”主要负责编纂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省彝族、傣族、壮族土司“译语”,此外,还编纂东南亚周边藩属国“译语”。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猓译语》、《广西庆远土司译语》、《广西镇安土司译语》、《广西太平土司译语》、《车里译语》、《猛緬译语》、《猛麻译语》、《樊夷译语》、《镇康译语》、《猛卯译语》、《潞江译语》、《湾甸译语》、《耿马译语》、《孟连译语》、《南甸译语》、《芒市译语》、《干崖译语》、《暹罗番书》、《苏禄译语》、《缅甸番书》等二十四种,二十八册。

第一,“百夷馆”主持编纂的“译语”中收录云南省各族词语的“译语”最多,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译语”中收录云南省东川府属、永昌府属、镇沅府属、普洱府属、顺宁府属之民族语言的“译语”,共十八种,十八册,今统称为“云南译语”。

在“云南译语”中成书最早的是《猓译语》,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成书。《猓译语》收录彝族语言,是彝、汉语合璧词典,共五种,各一册。每册封面题名和卷端上题均为“猓译语”,第一册卷端下题“东川府属”,

应是收录东川府属彝族语言。其东川府,设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隶属云南布政使司,十六年(1383年)改隶四川省。至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对该区改土归流,仍置东川府。雍正四年(1726年)又改属云南省,府址设于会泽,即今云南省会泽县,因此《猓罗译语》也属于“云南译语”之一。此书分十六门,比西番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方隅、经部、文史、香药四门。第二至五册卷端下没有标注采集词语的地域名称,其第四册收录十九门,比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衣服一门。第二、三、五册均收二十门,所收类目及编排顺序与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完全一致。其中第一册只收二百八十条词语,第二册收七百三十八条词语,第三、四、五册均收七百四十条词语。合计五册,共三千二百三十八条词语,其中第一种所收词汇量最少。

在“云南译语”中收录永昌府属地耿马、镇康、猛卯、遮放、潞江、南甸、盏达、陇川(陇川县傣族)、湾甸、猛猛、芒市、孟连(孟连县傣族)、千崖等地民族语言的“译语”,共九种,九册。

《镇康译语》,卷端下题“永昌府属”,主要收录云南省永昌府属地民族语言,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人事、饮馔、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颜色、衣服、珍宝、数目、通用,共十七门,收七百九十四条词语,其中饮食门缺页,比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经部、文史、方隅、香药四门,此外饮馔、颜色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饮食、彩色门名。

《猛卯译语》、《潞江译语》、《湾甸译语》三种均收十六门,比《镇康译语》少收饮馔一门。其余类名及编排顺序与《镇康译语》完全一致。其中《猛卯译语》卷端下题“永昌府属遮放同”,收四百七十三词语。《潞江译语》卷端下题“永昌府属”,收七百四十四条词语;《湾甸译语》卷端下题“永昌府属猛猛同”,收四百十三条词语。

《耿马译语》、《孟连译语》所收类名及词语编排顺序与《镇康译语》相近,《耿马译语》卷端下题“永昌府属”,分十五门,收三百五十条词语。只比《镇康译语》少收通用一门。《孟连译语》,卷段下题“永昌府属”,分十四门,收三百七十四条词语,只比《镇康译语》少收数目、通用二门。

《南甸译语》、《芒市译语》所收类名与《镇康译语》相近,但词语编排顺序不完全一致。《南甸译语》卷端下题“永昌府属盏达陪陇川同”,分天文、地理、时令、人事、身体、衣服、器用、军器、珍宝、颜色、数目、花木、果品、宫室、鸟兽、人物,共十六门,收三百三十四条词语,比《镇康译语》少收饮馔、通用二门,多收军器、果品二门,其军器、果品二门在其他“云南译语”中均没有收录。《芒市译语》卷端下题“永昌府属”,分天文、地理、时令、人事、人物、身体、花木、鸟兽、宫室、器用、颜色、饮馔、衣服、珍宝、数目,共十五门,收四百五十八条词语,比《镇康译语》少收通用一门。

《千崖译语》,其卷端下题“永昌府属”,分天文、地理、时令、人事、身体、衣服、器用、鸟兽、颜色、数目、花木、果品、宫室、鸟兽、人物、饮馔,共十五门,收三百三十六条词语。

总之,以上九种“译语”均收录云南省永昌府属地民族语言。清代永昌府属地,相当于今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永平县以南,澜沧江以西,怒江、龙川江以东及缅甸联邦萨尔温江以东、南卡江以北地区。

“云南译语”中还有收录镇沅府属之《僂夷译语》、普洱府属之《车里译语》、顺宁府属之《猛麻译语》、《猛甸译语》等“译语”,共四种,各一册。与以上永昌府属九册合为一函。

其《车里译语》卷端下题“普洱府属”,收录普洱府属地民族语言的“译语”,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

鸟兽、人事、人物、身体、宫室、器用、饮饌、衣服、颜色、珍宝、数目、通用，共十六门，收四百二十五条词语。所收类名及编排顺序均与《镇康译语》、《南甸译语》相近，比其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经部、文史、方隅、香药四门。还以宫室、饮饌、颜色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之宫殿、饮食、彩色门名。

《猛緬译语》、《猛麻译语》卷端下题均为“顺宁府属”，是收录顺宁府属地民族语言的“译语”，均分十五门，收三百七十八条词语，此二“译语”所收类名及编排顺序、词汇量均一致，并与《镇康译语》相近，只比《镇康译语》少收通用一门。比其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经部、文史、方隅、香药、通用五门，还以饮饌、颜色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饮食、彩色门名。

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云南译语”中唯独《焚夷译语》所收类名及词语内容较特别，卷端下题“镇沅府属”，主要收录云南省镇沅府属地民族语言（今按板镇老城区），将词语分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业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后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讐忿以重身命等十六类，收一百十二条词语。其类名以讲述乡规、民约为内容，以七言诗体形式编写，正文半页四组竖写词语，每组三行，首行列本文，次行列汉文译词，第三行列汉文注音。

第二，“百夷馆”负责编纂的“译语”中还有收录广西庆远府、镇安府、太平府属地土州县司“译语”，共三种，三册，合为一函，今统称为“广西译语”。

其《广西庆远土司译语》，卷端上题为“庆远府属土州县司译语”，主要收录广西庆远府属地民族语言（今广西省河池地区宜州市及其周边），分十五门，收一百六十二条词语，比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时令、经部、方隅、珍宝、数目五门，此外以草木、声色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之花木、彩色门名。

《广西镇安土司译语》，卷端上题为“镇安府属土州县司译语”，主要收录广西镇安府属地民族语言（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德保县周边），分十一门，收七十一条词语，比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时令、彩色、经部、文史、方隅、珍宝、香药、数目、人事九门，此外以草木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之花木门名。

《广西太平土司译语》，卷端上题为“太平府属土州县司译语”，主要收录广西太平府属地民族语言（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周边），分十一门，收一百零七条词语，比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时令、彩色、经部、文史、方隅、珍宝、香药、数目、人事九门，此外以禽兽、草木门名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鸟兽、花木门名。

总之，三种“广西译语”词语编排顺序与新校勘之《西番译语》有所不同。

第三，“百夷馆”属下暹罗馆、缅甸馆及后增设之苏禄馆、南掌馆内编纂了收录东南亚藩属国语言的“译语”，因暹罗、苏禄、缅甸、南掌等国均为自顺治年至乾隆年间先后朝贡，其中暹罗国，即今泰国，位于缅甸之南，自顺治十年（1653）始派遣使臣请求朝贡，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被缅甸所破，四十六年（1781）复国后仍遣使入贡，定为三年一贡。苏禄国位于东南海中，即今菲律宾，自雍正四年（1726）始遣使朝贡，定为五年一贡。缅甸国位于云南东南，自乾隆十六年（1751）奏准入贡，因路途遥远，朝贡无定期。南掌国，即今

老挝,位于云南以南,于雍正八年(1730)奉表入贡,定为十年一贡。但“四译会同馆”内没有及时设立苏禄、南掌二馆,至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命在“百夷馆”属下增设苏禄馆,编纂《苏禄译语》。二十六年(1761)在“百夷馆”属下再设南掌馆,编纂《南掌译语》。如:

其暹罗、百夷、缅甸、八百、回回、高昌等书,着交与该国附近省分之督抚,令其采集补正。此外如海外诸夷、并苗疆等处,有各成书体者一併访录,亦照西番体例将字音与字义,用汉文注于本字之下,缮写进呈交馆勘校,以昭“同文盛治”。……十九年奏准:四译馆旧无苏禄国番书,令司官就该贡使询问采集,审别音义,恭呈御览后,送交军机处。二十三年奏准:朝鲜通官裁去六品四人,七品二人,增设八品二人。二十六年奏准:四译馆旧无南掌国番书,就该贡使询问,据录出所能记忆者,审音分类,总共六百十有二字,进呈御览”¹。……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暹罗番书》、《苏禄译语》、《缅甸番书》等收录周边藩属国语言的“译语”,共三种,七册,其《暹罗番书》收录泰国马来语词语,二册。每册封面题名和卷端上题均一致,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身体,共六门,收四百九十六条词语;第二册分饮食、衣服、宫室、器用、珍宝、文史、花木、香药、鸟兽,鱼虫、彩色、方隅、数目、通用,共十四门,收四百七十五条词语。合计二十门,九百七十一条词语。所设类数与新校勘之《西番译语》相同,但类名及编排顺序不完全相同,以鱼虫门代替了新校勘之《西番译语》之经部门。

《苏禄译语》,卷端上题为“苏禄番书”,收录菲律宾语,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身体、饮食、衣服、宫室、器用、珍宝、文史、花木、鸟兽、鱼虫、彩色、方隅、数目、通用,共十九门,收四百零七条词语,后附贡物内三种名目,合计四百十条词语。比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经部、香药门二门,多收鱼虫门一门。

《缅甸番书》收录缅甸语,四册。每册封面题名和卷端上题均一致,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共四门,三百六十四条词语;第二册收录人事、身体,共二门,收二百八十三条词语;第三册分饮食、衣服、宫室、器用、珍宝,共五门,收二百九十九条词语;第四册分文史、花木、香药、鸟兽,鱼虫、彩色、方隅、数目、通用,共九门,收二百七十六条词语;合计二十门,一千二百二十二条词语。比新校勘之《西番译语》,少收经部一门,多收鱼虫一门,词汇量也多一些。遗憾的是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译语”中没有《南掌译语》。

总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华夷译语》中百夷馆负责编纂的“译语”共二十四种,二十八册。其中“云南译语”共存十八种,十八册。其多数“译语”编纂体例基本一致,约分十五至十六门,其类名、排列顺序及收录词语均相近,随之所收词汇量也接近,但饮饌、颜色等门名与新校勘之《西番译语》有所不同,《南甸译语》所收军器门、果品门是独有的门名,在其他任何“译语”中均没有收录。在“百夷馆”编纂的“译语”

¹ (清)托津等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〇一,礼部,第9页,清嘉庆二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中只有《干崖译语》所收词汇量及门类较少。编纂这些云南地区各民族“译语”时,先以原“四译馆”属下八百馆编的“译语”为基础,然后在就近省分访录补正,最后由“会同四译馆”属下“百夷馆”审订编译而成。

“百夷馆”所编“译语”中只有《斐夷译语》类名以讲述乡规、民约为内容,以七言诗体形式编写,但词语编排体例与其他“译语”基本一致。“广西译语”共三种,三册。这些“译语”编纂体例基本一致,多数分十一门,其类名、排列顺序及收录词语均相近,随之词汇量也接近,但与新校勘之《西番译语》有所不同,其中《广西太平土司译语》、《广西镇安土司译语》所收门类及词汇量较少。这些“译语”均是原八百馆编“译语”基础上,访录就近省分补正,然后进呈御览后交给军机处审订,再由“会同四译馆”属下八百馆校勘而成。收录东南亚藩属国语言的“译语”,三种,七册。其编纂体例基本一致,其类名、排列顺序及收录词语均相近,唯独鱼虫门是独有的类名。而境外各藩属国“译语”主要是采访朝贡使臣而成。

五 “西洋馆”编纂的各“译语”

自清顺治年开始,由英国、法国、拉丁国、意大利国、葡萄牙国、德国等国不少传教士供职钦天监,此外,这些国家有时派遣贸易使臣与清廷往来,因此清乾隆年间在紫禁城内咸安宫附近设立了一处专门纂修这些外国“译语”的“西洋馆”。目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咭喇国译语》、《弗喇安西雅语》、《拉氏诺语》、《伊达礼雅语》、《播都噶礼雅语》、《额呼马尼雅语》等六种“西洋译语”,共二十七册。

《咭喇国译语》为英语、汉语合璧词典,二册,一函。第一册分天文(因缺第一页,但收有天文门词语)、地理、时令、人物、身体、宫殿、器用、饮食、衣服、声色,共十门,收三百五十四条词语;第二册分经部、文史、方隅、花木、鸟兽、珍宝、香药、数目、人事、通用,共十门,收三百七十六条词语;合计七百三十条词语。

《弗喇安西雅语》为法语、汉语合璧词典,五册,一函。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采色,共四门,收四百二十五条词语;第二册分身体、人物、器用,共三门,收三百九十条词语;第三册分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经部、珍宝,共六门,收三百七十五条词语;第四册分文史、鸟兽、数目、通用,共四门,收四百二十八条词语;第五册分香药、花木、人事,共三门,收四百二十八条词语;合计两千零四十六条词语。《拉氏诺语》为拉丁语、汉语合璧词典,五册,一函。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采色,共四门,收四百十一条词语;第二册分身体、人物、器用,共三门,收三百九十条词语;第三册分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珍宝、经部,共六门,收三百七十四条词语;第四册分文史、鸟兽、数目、通用,共四门,收四百三十一词语;第五册分香药、花木、人事,共三门,收四百五十五条词语;每门卷端上题为“西洋馆”,门名下题为“拉氏诺语”,合计两千零六十一条词语。

《伊达礼雅语》为意大利语、汉语合璧词典,五册,一函。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采色,共四门,收四百二十一条词语;第二册分身体、人物、器用,共三门,收三百九十条词语;第三册分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经部、珍宝,共六门,收三百七十五条词语;第四册分文史、鸟兽、数目、通用,共四门,收四百二十七条词语;第五册分香药、花木、人事,共三门,收四百五十七条词语;合计两千零七十条词语。

《播都噶礼雅语》为葡萄牙语、汉语合璧词典，五册，一函。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采色，共四门，收四百二十一条词语；第二册分身体、人物、器用，共三门，收三百九十条词语；第三册分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经部、珍宝，共六门，收三百七十五条词语；第四册分文史、鸟兽、数目、通用，共四门，收四百二十八条词语；第五册分香药、花木、人事，共三门，收四百六十三条词语；每门卷端上题为“西洋馆”，门名下题为“播都噶礼雅语”，合计两千零七十七条词语。

《额呼马尼雅语》为德语汉语合璧词典，五册，一函。第一册分天文、地理、时令、彩色，共四门，收四百二十一条词语；第二册分身体、人物、器用，共三门，收三百九十条词语；第三册分宫殿、饮食、衣服、方隅、珍宝、经部，共六门，收三百七十四条词语；第四册分文史、鸟兽、数目、通用，共四门，收四百三十一条词语；第五册分香药、花木、人事，共三门，收四百五十五条词语；合计两千零七十一条词语。

此外，西洋馆还负责编纂了收录梵语的《西天真实名经》。如：

乾隆帝上谕礼部曰：“朕阅四译馆所存外裔番字诸书，虽分类音译名物，朕所识者，西番一种，已不无讹缺。因思象胥译，职在周官，輶轩问奇，载于汉史。我朝声教四讫，文轨大同。既有成编，宜广为搜辑，加之核正。悉准重考西番书例，分门别类，汇为全书。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¹。

《西天真实名经》一种，一册，共收五百十九条词语，不分类，正文半页四行，六组词语，词语条目竖写，首行列梵文字，次行列汉文对音字或切音字。

总之，西洋馆负责编纂的“译语”存世七种，二十八册。其中只有《西天真实名经》体例较特殊，词汇量较少。而六种“西洋译语”编纂体例基本一致，词语均分二十门，门名及词语排列顺序也与新校勘之《西番译语》相同。但其中《咭喇国译语》与其余五种“西洋译语”有所不同。

首先，封面书名有所不同。只有《咭喇国译语》有“译语”字节，而其余五种“西洋译语”没有“译语”字节，卷端题名为《……话》，封面题名为《……语》。其次，卷端题名不同。《咭喇国译语》卷端没有“西洋馆”字节，只有第二册卷端上题为“咭喇国译语”；其余五种“西洋译语”，每类类名上题为“西洋馆”，下题为书名。再者，词汇量不同。《咭喇国译语》只收七百三十条词语，词汇量较少；而其余五种“西洋译语”均收录两千余条词语。

从此可见，《咭喇国译语》应最初成书，之后形成的其余五种“西洋译语”体例规范，词汇量增加。其实礼部“会同四译馆”属下未曾设立西洋馆，那么所谓的“西洋馆”究竟何时在哪个机构下设立的。据人民大学教授黄兴涛著《〈咭喇国译语〉的编纂与“西洋馆”问题》²得知：于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由于通商贸易需要，在内务府属下曾设立“西洋学馆”，招内务府官员子弟教习拉丁语，学期五至七年，曾招收三批学员，共培养四十名学员，其中二十名毕业后补笔帖式等职。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宋君荣等曾任教，当时

¹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四，第25～26页，中华书局，1986年。

² 黄兴涛：《〈咭喇国译语〉的编纂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一期。

也没有英国传教士教习。但黄兴涛考订：编纂西方“译语”，与“西洋学馆”毫无关联，早在乾隆八年（1744年）十二月十二日已裁撤“西洋学馆”。为编纂西方“译语”，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咸安宫附近新增设了“西洋馆”，编者是广州十三行英语“通事”。如：“《咭喇国译语》记录语词并不准确，可能是广州十三行英语通事所作，其余五种西方译语翻译较为准确。”

结语

“会同四译馆”及军机处一同纂修的“译语”无论数量及编纂体例、收录词汇量方面均与明代“译语”及清早期由“四译馆”编的“译语”有区别。因明代所编“译语”及清早期“四译馆”编刊的“译语”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有些“译语”没有列本民族文字，每组单词只二栏，上栏列由汉字拼切的民族语言词语，下栏列汉文译词。

第一，“会同四译馆”及军机处一同纂修的《华夷译语》（丁种本）数量居多，目前仅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四十二种，七十一册。此外还有不少散存于国内外公共图书馆及个人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编纂的“译语”约有百余种。其中“会同四译馆”及军机处一同纂修的《华夷译语》（丁种本）究竟有多少种，笔者不得而知。笔者推测：与乾隆年间皇帝敕修《皇清职贡图》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清廷大力组织人员，调查与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各边疆民族及朝贡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习俗及使用的方言土语，为此产生了这举世瞩目的《华夷译语》和《皇清职贡图》，此二种书所收民族成分及藩属国应相吻合，但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有各“译语”中未发现高昌馆、俄罗斯馆编纂的“译语”。

第二，“会同四译馆”及军机处一同纂修的《华夷译语》（丁种本）编纂体例基本一致，半页横写四组词语，每组单词包括民族文字、汉文译文、汉文注音共三栏。唯独《西天真实名经》和《斐夷译语》、《琉球土语》编纂体例较特殊，均竖写。这些“译语”的编纂方法与现代语言学家调查语言或方言的方法基本一致，首先，在第二栏写好汉语词语，然后在第一栏填补各民族语言对译词，最后在第三栏再由汉字注音。

因这些“译语”当时尚未刊行，均为孤本，珍藏在皇宫大内。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及故宫出版社发掘整理影印出版，为世人展示罕见的资料，也可为十八世纪西欧、东南亚及我国西南地区民族语言学和翻译史研究，提供极大的语料库。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